

ACADEMIC FRONTIERS SERIES

学术前沿系列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 Classic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领导学

Leadership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著
(James MacGregor Burns)

常 健 孙海云 等 译
常 健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CADEMIC FRONTIERS SERIES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

学术前沿系列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 Classic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领导学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著
(James MacGregor Burns)

常健 孙海云 等 译
常健 校

Leadership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领导学/(美) 伯恩斯著; 常健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 学术前沿系列)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300-16815-9

I. ①领… II. ①伯… ②常… III. ①领导学 IV. ①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026 号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
学术前沿系列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领导学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James MacGregor Burns) 著
常 健 孙海云 等 译
Lingdao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1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62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

总 序

在当今社会，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成为控制社会、影响社会的最大的两股力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体系在创造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民主的、负责任的、有能力的、高效率的、透明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无论是对经济的发展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 20 世纪初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仍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教育也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因此，广大教师、学生、公务员急需贴近实践、具有可操作性、能系统培养学生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材。我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固然取决于多方面的努力，但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了解、研究、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研究和实践的成果；另一方面，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政府行政改革，致力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体制，这同样需要了解、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无论从我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教育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还是从我国政府改革的实践层面，全面系统地引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著作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

出于上述几方面的考虑，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了这套《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为了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当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套丛书分为六个系列：（1）经典教材系列。引进这一系列图书的主要目的是适应国内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教育对教学参考及资料的需求。这个系列所选教材，内容全面系统、简明通俗，涵盖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主要知识领域，涉及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公共组织理论与管理、公共政策、公共财政与预算、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行政的伦理学等。这些教材都是国外大学通用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教科书，多次再版，其作者皆为该领域最著名的教授，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多次获奖，享有极高的声誉。（2）公共管理实务系列。这一系列图书主要是针对实践中的公共管理者，目的是使公共管理者了解国外公共管理的知识、技术、方法，提高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内容涉及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公共管理者、如何开发管理技能、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政府标杆管理、绩效管理等。（3）政府治理与改革系列。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均开展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政府再造或改革成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热点和核心问题。这一系列选择了在这一领域极具影响的专家的著作，这些著作分析了政府再造的战略，向人们展示了政府治理的前景。（4）学术前沿系列。这一系列选择了当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如



新公共行政、批判主义的行政学、后现代行政学、公共行政的民主理论学派等的著作，以期国内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了解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

(5) 案例系列。这一系列精心选择了公共管理各领域，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发展、非营利组织管理等领域的案例教材，旨在为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教学提供参考。

(6) 学术经典系列。这一系列所选图书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伦纳德·怀特、赫伯特·A·西蒙、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等人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称得上是公共行政学发展的风向标。

总的来看，这套译丛体现了以下特点：(1) 系统性。基本上涵盖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主要领域。(2) 权威性。所选著作均是国外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大师，或极具影响力的作者的著作。(3) 前沿性。反映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最新的理论和学术主张。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公共行政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曾这样讲道：“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的确，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事实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政准则。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立足于对中国特殊行政生态的了解，以开放的思想对待国际的经验，通过比较、鉴别、有选择的吸收，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理论，并积极致力于实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体制及公共管理模式，是中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发展的现实选择。

本套译丛于1999年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策划和组织出版工作，并成立了由该领域很多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公共管理综合研究所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我国的一些留美学者和国内外有关方面的专家教授参与了原著的推荐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许多该领域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参与了本套译丛的翻译工作。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编辑委员会

献给琼

……肥美的草场……栖息在巢中的雏鸟
逃过了收割者高举的刀镰；
绽放出花朵的青草拥满了原野
却被天空高悬的烈焰耙扰晒干。

《高空的收割》

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是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是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

——马基雅弗利

总统之位……是道德领导的卓越之地。我们所有伟大的总统，都是当国家生活中某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观念需要澄清时，作为思想的领导者挺身而出……总统的职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使我们重新应用或在新的条件下应用人类行为的那些我们一贯依赖的简单准则。如果没有机警的对变化敏感的领导，我们都会陷入泥淖或者迷失道路。

——富兰克林·D·罗斯福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①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力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②

这就是领导艺术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

^① 毛泽东：《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12～10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译者注

^②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译者注



译者为作者作序，经常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作者的思想已经在全书中展现，无须译者赘述；对作者思想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无须译者强加。所以，译者能够做的更有意义的事情，也许是将作者的背景和思想发展进程介绍给读者，使读者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阅读。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1918 年 8 月 3 日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市郊的梅尔洛斯 (Melrose)。他排行老二，曾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但只有他长大成人。他生长在自由主义的家庭环境中，家人们在餐桌上谈的是如何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且据说他的曾曾曾曾祖父曾留宿路过他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并在道格拉斯临行前借给这位由奴隶转变为反奴领导人的传奇人物三美元。

在选择上哪所大学时，伯恩斯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而进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这是因为该大学所在的环境所吸引了他。1938 年毕业后，他来到华盛顿，在犹他州民主党人阿贝·莫多克 (Abe Murdock) 的办公室做青年实习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于 1943—1946 年到军队服役，在太平洋战区担任战争史学家，并因在塞班岛、关岛和冲绳岛战役中的贡献而被授予青铜星章和四枚战争星章 (Battle Stars)。

二战后，伯恩斯进入哈佛大学，在那里获得了他的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 年，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博士后，并在那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考问国会》(Congress on Trial)；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这本书赢得了《纽约时报》书评的赞扬,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此后,他接受了威廉姆斯学院政治学的教职,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退休。

伯恩斯希望将他的理论与政治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但前提是要在道德上站得住脚。他曾经是四届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于1958年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他在马萨诸塞州第一国会选区获得民主党提名,竞选以失败告终。当约翰·肯尼迪准备竞选总统时,曾邀请他加盟竞选班子,但遭到了他的拒绝。这是因为,尽管他对肯尼迪个人非常欣赏,但“却对其是否具备总统这一职位所要求的全部品质没有把握”^①。直到两年后,他才决定支持肯尼迪的竞选,并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积极为肯尼迪寻求支持。他还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顾问,但后来却猛烈抨击克林顿-戈尔的中间主义路线。

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伯恩斯进行了大量的领导学研究。他与别人合编了一本关于政府管理的教科书《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非常畅销,多次再版,现在仍然是美国大学生的重要教科书。这使他有充裕的财力来写作那些更专深但销量较小的著作。

伯恩斯写过多部美国总统的传记性研究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两本传记,一本是1956年出版的《罗斯福:狮子和狐狸 1882—1940》(*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1882—1940*),另一本是1970年出版的《罗斯福:自由战士 1940—1945》(*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1940—1945*)。伯恩斯因这两本书而于1971年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全国图书奖。此外,他也为肯尼迪父子写过两本传记:《约翰·肯尼迪:一位政治人物》(*John Kennedy: A Political Profile*) (1960)和《爱德华·肯尼迪与盛世传统》(*Edward Kennedy and the Camelot Legacy*) (1976)。1968年,他编辑了约翰逊的文集《医治与构筑:林登·约翰逊的计划》(*To Heal and to Build: The Programs of Lyndon B. Johnson*)。1999年,他与政治学家乔治亚·索伦森(Georgia Sorenson)合作发表了《僵死的中间:克林顿-戈尔的领导方式与温和中庸的危险》(*Dead Center: Clinton-Gore Leadership and the Perils of Moderation*)。2001年,他与威廉姆斯学院的历史学家苏珊·丹(Susan Dunn)合作出版了《三个罗斯福:转变了美国的贵族领导者》(*The Three Roosevelts: Patrician Leaders Who Transformed America*)。2004年,他出版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一书。

与此同时,伯恩斯也从政治领导的角度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并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1958年与杰克·贝尔塔森(Jack W. Peltason)和理查德·泰勒(Richard W. Taylor)等人合编的《美国政府的功能与政策:大型民主在行动》(*Functions and Policie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Big Democracy in Action*);1963年出版的《民主制的僵局:美国的四党政治》(*The Deadlock of Democracy: Four-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1964年出版的《对话美国精神》

^① James Burns, *John Kennedy: A Political Profil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0.



(*Dialogues in Americanism*); 1965年出版的《总统政府：领导者的熔炉》(*Presidential Government: The Crucible of Leadership*); 1972年出版的对美国领导的诊断分析性著作《非凡的智慧》(*Uncommon Sense*); 1981年与帕特里夏·波诺米(Patricia Bonomi)和奥斯汀·拉尼(Austin Ranney)合编的《强弱党派之下的美国宪政体系》(*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under Strong and Weak Parties*); 1982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美国的实验》(*American Experiment*),第一卷《自由的葡萄园》(*The Vineyard of Liberty*),第二卷《民主的工场》(*The Workshop of Democracy*),第三卷《自由的逆风》(*The Crosswinds of Freedom*); 1984年,他出版了《领导力：美国总统制的危机》(*The Power to Lead: 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1990年,他与马尔文·欧文比(L. Marvin Overby)合作出版了《鹅卵石领导：多数决定与少数权力》(*Cobblestone Leadership: Majority Rule, Minority Power*); 1991年,他出版了《人民的宪章：在美国追求权利》(*A People's Charter: The Pursuit of Rights in America*); 1992年他出版了《民主党人必须领导：进步民主党的案例》(*The Democrats must Lead: The Case for a 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

在对多位美国总统和美国政治领导体制研究的基础上,伯恩斯将领导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世界各国,并提出了关于领导的独树一帜的理论。这集中体现在他于1978年出版的《领导论》一书。这一直是他最偏爱的一部著作,被学界推为领导学研究领域的经典,被翻译成多国文字。2003年,他又出版了《变革型领导：对幸福的新追求》(*Transforming Leadership: A New Pursuit of Happiness*)一书,进一步发展他关于变革型领导的理论。2004年,他与乔治·哥萨尔斯(George R. Goethals)和乔治亚·索伦森合编了四卷本的《领导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eadership*)。

伯恩斯领导学理论的核心,是变革型领导的理念。该理论有三个主要支点。

第一,他将领导定义为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伯恩斯的观点,传统的领导概念,其主导形象是总统或首相居高临下向大众宣讲。然而,真正的领导实际上并不在于权力和统治,而是一种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定义,领导就是引导追随者依照领导者和追随者共有的价值和动机去行动。这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其最高境界是领导者努力提升追随者的意识,其最低限度则是使领导者与追随者共同致力于一个共同的事业。

第二,他区分了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所谓“交易型领导”,就是“为了交换有价值的东西而主动联系他人”。与此相对,所谓“变革型领导”,则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以互相提升动机和道德水平的方式而彼此结合”。虽然变革型领导者的最初动力是追求个人得到承认,但最终由于与其追随者的渴望结合在一起而促进了集体目的的实现。在他看来,毛泽东和甘地深得变革型领导之精髓,他们迎合了人民的最初需要,但同时又高度关注人民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和渴望。

第三,他强调变革型领导是一种道德领导。为此,伯恩斯特别区分了“领导



者”与“掌权者”：领导者是以某种方式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掌权者则只是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管这种目的是否是其实施权力的对象所共有的。根据这种定义。希特勒就不能算是领导者，而只是一个掌权者。

在伯恩斯看来，领导并不限于政治领域，它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之中，从伟大的领袖到母亲和教师，从同伴到顶头上司。但在每一种情况下，领导的关键都是去发现共同的目标以及在动机和价值方面的相互作用。借助于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伯恩斯提出，领导就是将人们从较低的需求和道德发展水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真正的领导者是那种追求自我实现需求的个人，他们的动机是成长、成效和成就，即自我实现，而不是出名。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会认真关注他人的需求，并向他人学习，因而具有“被被领导者领导的能力”，从而能够通过帮助追随者意识到他们真正的需求而领导他们去达到他们的自我实现。

伯恩斯从变革型领导理论的视角，对美国和世界各国的领导者进行了广泛的分析。

早在1956年所写的《罗斯福：狮子和狐狸 1882—1940》中，他就指出，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够娴熟地在交易型领导风格与变革型领导风格之间变换。交易型领导者是经纪人，是“狐狸”，在各种竞争的利益之间进行交换，使组织或国家的“战舰”保持平稳。而变革型领导者则是“狮子”，他能够促成广泛和深刻的变革，使新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替代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罗斯福的新政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就体现了变革型领导者的特征。

1999年出版的《僵死的中间：克林顿-戈尔的领导方式与温和中庸的危险》一书，备受争议且影响广泛。在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时，伯恩斯曾对他寄予厚望。但随着克林顿医疗改革政策的失败，伯恩斯对克林顿的领导方式产生了怀疑。在这本书中，伯恩斯与索伦森强烈批评克林顿和戈尔的温和主义的中间路线战略，指出它与过去50年美国总统所奉行的战略大相径庭。它开创了一种优柔寡断的领导作风，无法使真正的领导得以实现，并将对美国政治产生负面的影响。伯恩斯强调，最好的领导者是变革型的，他们无惧于公众舆论和政治上的阻力。在美国总统中，伯恩斯最欣赏的变革型领导者是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其次是罗纳多·里根，这并不是因为他同意里根的政治主张，而是欣赏里根的领导方式。

2000年5月14日，针对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伯恩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强作温文：勇猛非过》（Dive in Gents, Boldness is No Vice）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将人们吸引到投票站的东西，与吸引人们看精彩拳击赛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要看的是一场精彩的战斗。但这一年的选战却不是这样精彩。候选人并没有撩起选民的激情，选民们看到的是中偏点右的布什和中偏点左的戈尔，他们采取的都是温和中庸的立场，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并不存在真正的选择，也没有真正的理由去选择。他进一步指出，在这一年的选战中，教育问题需要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但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像过去30年的



许多其他总统候选人一样，布什和戈尔都立志要做“教育总统”。但此前没有人成功，他们两人也不会成功。这是因为他们的渐进路径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大危机，就不会有变革型领导。伯恩斯不以为然，因为西奥多·罗斯福、林登·约翰逊和罗纳多·里根都是在没有重大危机的情境下实现了变革型领导。这里的关键在于，变革型领导的重要领导艺术之一，是将潜在的危机转变为可见的、重大的危机，从而促进变革的实现。只有具有交易型领导的技巧的变革型总统，才能带来所需要的巨大变革。中间路线不仅不能产生出这样的总统，而且也不能使获胜的候选人负有赢得这种变革型领导的壮举所需要的动力和使命。2000年7月，小伊利奥特·罗斯福（Elliot Roosevelt Jr.）宣布他支持乔治·W·布什，并声称他的祖父富兰克林·罗斯福如果在世也会赞成布什的社会保障计划。伯恩斯与苏珊·丹立即撰文反击，该文以“罗斯福——被背叛与背叛者——但在某些方面的忠实”（Roosevelts—Betrayed and Betrayers—but Loyal in Some Ways）为题发表在2000年8月10日的《洛杉矶时报》上。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富兰克林的标志性法案，是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利益汇聚在一个庞大的相互支持的项目之中。而布什的半私有化的计划，是对这一根本要义的背叛。

在2001年出版的《三个罗斯福：转变了美国的贵族领导者》中，伯恩斯和苏珊·丹回顾了三位罗斯福如何通过他们的领导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图景。从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交易，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和战时领导，再到埃莉诺·罗斯福在联合国初创时期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该书通过对这三位领导者的生平的分析，展现出他们如何从纽约封闭的精英圈子中脱颖而出，对抗经济特权阶层，从而成为美国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政治家族。

在2003年出版的《变革型领导：对幸福的新追求》一书中，伯恩斯探讨了领导者如何从“交易者”（deal-makers）转变为重大社会变革的代言人。他强调，领导者必须倾听他们的追随者，因为这些追随者也具有做出重大贡献的潜能。领导者是通过充分回应追随者的需求和愿望而取得领导地位的。对创造性领导的最终检验不仅在于新观念的创造，而且在于使这些新观念在现实中获得生命。他指出，21世纪对领导的最大挑战，就是用领导的方式来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在这本著作中，他用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的尺度来衡量许多现代领导者。被划入变革型领导者之列的有18世纪的英国国会议员亨利·约翰 [Henry St. John (Lord) Bolingbroke] 和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19世纪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伊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倡议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法国外交家雷赛（Ferdinand De Lesseps）、英国首相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印度的“圣雄”甘地、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Lech Walesa）、捷克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等，毛泽东也被列入变革型领导者之列，虽然伯恩斯认为他缺乏交易型领导的技巧。被列入交易型领导者之列的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拿破仑、克林顿等，伯恩斯无法完全确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当归属哪类。



伯恩斯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在领导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到 2003 年,在领导学研究领域中,有 600 多篇博士论文以它作为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的主要思想,被高度概括在我们现在看到的《领导论》这本经典名著之中。

伯恩斯在领导学界有很高的声望。他曾当选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马萨诸塞州波克夏县反歧视委员会主席,并是享有盛名的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的会员。1997 年,他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与乔治亚·索伦森共同主持了萨尔茨堡领导学研讨会。他现在是马里兰大学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导学院(The James MacGregor Burns Academy of Leade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资深学者,他曾经努力劝说该学院不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但担任该院院长的前参议员比尔·布拉德雷(Bill Bradley)却执意要用。然而伯恩斯在提到该学院时,从来不加自己的名字,他说他“从没有这样的奢望”。1992 年,他成为里奇蒙德大学杰普逊领导学院(the Jepson School of Leade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Richmond)的创始成员(founding faculty)和资深教授,该学院是美国第一所授予领导学研究本科和硕士学位的学校。他仍然是威廉姆斯学院政治学名誉教授。2005 年春季学期,伯恩斯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中心做访问学者。

根据美国专栏作家皮尔·特里斯坦姆(Pierre Tristam)1999 年 4 月 19 日对伯恩斯所作的采访记述^①,伯恩斯结过两次婚,有四个孩子。他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他与前妻琼(Joan)共同照管他们的金毛猎犬杰斐逊——它的名字是以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来命名的。白天,这条狗待在伯恩斯的房子里。到了傍晚,伯恩斯会向它仪式般地唱一首歌,接着便会打开后院的玻璃门,看着它跑下山坡,奔向琼的住所。他每天写作两三个小时,每周工作 6 天,并用同样多的时间阅读。只有在他不写作时,他才会感到无聊和不适。他并不看电视,但阅读《纽约时报》,并从来访者那里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

评论家们经常称赞伯恩斯那气势如虹的文风,赞赏他那种将支离破碎的历史事实和种种散乱的分析构造成天衣无缝的宏大叙事的能力。但他在写作时也不时会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这时,他就会这样鼓励自己:“詹姆斯,你是如此幸运能够从事写作,能够有出版合同。而其他人却在做那些艰苦的令人生厌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有它的低潮。现在这只不过是你的低潮期。”伯恩斯所写的书并非都很畅销,三卷本的《美国的实验》已不再印刷。有些人认为在当今这个渐进主义和专业化盛行的时代,他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和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似乎并不合时宜。但伯恩斯并不悲观,他认为挫折和暂时的后退是实验尝试的应有之义。他一直还在积极从事领导学的研究和写作。

在此译本即将出版之际,身在美国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的本书译者之一常健试

^① Pierre Tristam, American Impressions; Massachusetts—The Leader, April 19, 1999, in http://www.theledger.com/static/americanimp/0419_massachusetts.html.

图与 88 岁高龄的伯恩斯教授取得联系。2006 年 5 月 11 日早晨 8 点左右, 接到伯恩斯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询问了此书翻译的具体情况, 并对译者的工作表示感谢。他说他正忙于完成一本新书——*Running Alone*^①, 预计在 2006 年 9 月出版。他谈到多年前曾经到访中国, 但中国这些年发展迅速, 很多情况都与以前不同了。他给译者留下他在马萨诸塞州的住址, 希望译者能够写信告诉他领导学在中国讲授和发展的状况。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的时代需要变革型的领导, 特别需要具备交易型领导技巧的变革型领导。对那些希望在中国的变革大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者来说, 伯恩斯在此书中详细阐述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和各种实例分析, 无疑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常 健

于美国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

^① 该书简体中文版译本已正式出版: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总统领导力》,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欣闻中国师生——其中一些是我在一些年前访问中国时结识的——希望我为这个新的译本作序。对领导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探求领域，我很高兴地得知，在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大学中，领导学的研究正日益广泛。

与诸如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及其他一些源远流长的学科相比，对领导的系统的和分析性的研究，在西方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我在威廉姆斯学院和哈佛研究的都是政治学。我后来也教授政治学，但日益转向领导的理论和实践。[我在1958年与约翰·肯尼迪（John K. Kennedy）一同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结果他赢了，我输了!]

我为什么从政治学转向领导学？部分原因是政治学倾向于强调制度和过程，而我却越来越对研究政治哲学和道德问题感兴趣。我逐渐相信，对领导者的检验，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而不是看其如何进行政治交换、居间代理、“巧取豪夺”这样的“交易”事项。简言之，理念是构成领导的关键因素。对我来说，这种超越性的理念来自于所谓的启蒙运动——中国读者将会采用自己的哲学标准，它既可以来自西方的伟大理念，也可能出自东方的智慧学说。

我观察到，在有着强大道德基础的变革型领导与单纯的行使权力或统治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生活在东方和西方的人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强势领导者，他们的唯一目标，似乎就是集聚更大的权力，却很少关心他们的“权力实施对象”。我认为，赤裸裸



的权力行使是与道德或伦理领导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对领导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领导者招募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又会反过来变成原先领导者的领导者。这必然会提出道德问题——用什么标准和尺度来检验和衡量这种动员过程。这种检验标准拒斥“盲目追随”——这又产生了更广泛、更复杂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领导研究的核心。

我被要求就中国读者应当如何阅读这本书提出建议。我的建议是批判性地阅读——这样，一些读者就可能会写出他们自己关于领导的与时俱进的著作，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新的研究能够利用过去二三十年来东方和西方领导学研究方法已经取得的成果。



领导危机

1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一个最为普遍的渴望便是对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的渴求。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年都曾生活在充满名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肖伯纳和斯特拉文斯基，毛泽东和甘地，丘吉尔和罗斯福，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时代里。这些名人中有很多都在 20 世纪的中叶故去；其他有一些则日薄西山，然而少数的几个人——如戴高乐，'尼赫鲁，也许还有肯尼迪和金日成——也进入了领袖的万神殿。这些伟人跨越了我们的文化、智力和政治视野。我们——遍及各地的追随者们——或爱戴他们，或憎恶他们；或追随他们，或反对他们；或为他们而死，或将他们中的一些人杀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中，我们与领导的生死与共已经让位于对个性的崇拜，让位于以令人惊叹（gee whiz）的方式对待各路名人。我们窥视领导人的私人生活，就好像他们的睡眠习惯、饮食习惯、性生活、爱犬和个人嗜好都传达出具有深刻意义的信息。所有的杂志都热衷于刊登有关“人们”鸡毛蒜皮的琐事，严肃报纸的新闻报道也总是先讲述某个名人的轶事或倾向，然后才进入事情的正题。在红场和天安门广场上，如潮人流高举着并非巨人的人的巨幅画像游行。个人崇拜——既崇拜英雄，也崇拜魔鬼——在东方和西方都是盛极一时。

目前，领导危机在于，如此多的当权男女平庸无能和不负责任，而又很少有领导脱颖而出以充分满足对它的需要。潜伏在平